

# 东晋时期东亚政局中的政治传统与权力运作

李 磊

**摘 要** 乐浪、带方二郡弃守于永嘉之乱，并非缘于边疆危机，而是西晋统治秩序崩溃的边疆表现。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仍在当地起着凝聚人心、塑造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作用。除二郡遗民与内地流民以郡县制为组织方式外，百济近肖古王余句亦通过领乐浪太守构建地区领导权，将倭人纳入其所主导的多边关系之中。东晋的天下秩序借由郡县制、都督制而存在。辛卯年东晋封授的辰斯王余晖被杀，继任的阿莘王与倭“和通”，东晋天下秩序短暂退场。义熙年间东晋国势复盛，但重构天下秩序却意在涵盖多边关系，表明东晋由直接统治者向多边关系调解者的身份转变，天下秩序亦由此发生变化。

**关键词** 东晋 天下 东亚 百济 倭

作者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5-0154-09

两晋之际天下秩序多元互动性的显现，成为前辈学者提出“东亚世界”形成论的事实依据。所谓“东亚世界”论，是从日本、朝鲜出发，将河西走廊以东的诸地域视作一个具有结构性与自律性的世界<sup>①</sup>。这一观察视角并不能囊括天下秩序的全部<sup>②</sup>，但却为理解天下秩序的多元互动性提供了一个可资观察的地域空间。围绕着“东亚世界”的形成问题，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成果<sup>③</sup>，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以东晋时期东亚政局为研究对象，探究百济、倭及晋王朝的多边关系，以此深化对这一时期天下秩序的性质及运作模式的理解。

## 一、郡县制传统与东晋前中期的朝鲜半岛政局

在“东亚世界”形成论的叙事中，两晋之际乐浪郡陷落于高句丽被看作是东亚历史的转折，中国王朝从此结束了对朝鲜半岛的直接统治，半岛南部形成百济、新罗等政权<sup>④</sup>。这一论断在宏观上自无疑义，然而百济与倭等新兴势力活跃于东亚政局中已在晋宋之际，距两晋之际已过半个世纪，且这一宏论遮蔽了郡县制传统对于乐浪郡陷落后东亚政局的影响。

自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以来，郡县制一直是朝鲜半岛的基本政治制度。

① “东亚世界”论，参见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高明士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8—103页。在此之前，前田直典已主张从全局把握东亚历史发展，见所著、黄约瑟译：《古代东亚的终结》，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35—151页。

② 堀敏一：《古代东亚世界的基本结构》，韩昇、刘建英编译：《隋唐帝国与东亚》，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19页。

③ 关于东亚世界论的学术史，参见李成市：《東アジア世界論と日本史》，《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22卷，東京：岩波書店，2016年，第41—71页。

④ 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高明士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8—103页。

曹魏、西晋时，半岛上形成乐浪、带方二郡体制<sup>①</sup>。四百多年里，郡县制不仅维系了朝鲜半岛的稳定，而且将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力投射至日本列岛。自西汉迄于曹魏，倭人或诣郡朝贡，或由郡太守送诣京都朝贡<sup>②</sup>。前者如《汉书·地理志》所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岁时来献见”指诣乐浪郡<sup>③</sup>。后者如《三国志·倭人传》所载，景初二年（238年），魏明帝遣海定乐浪、带方二郡，“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sup>④</sup>。可以说，以朝鲜半岛上的郡县制为主、辅以日本列岛上一些政权与朝廷的朝贡册封关系，构成了汉、魏、晋王朝的东亚政治秩序。

两晋之际乐浪郡的覆灭，并非是朝鲜半岛政局演化的结果，而是永嘉之乱的环节之一。按《资治通鉴》，时据乐浪、带方二郡的张统与高句丽相攻，连年不解，在乐浪大姓王遵的劝谏下，张统于建兴元年（313）率千余家归于慕容廆，慕容廆为之乐浪郡<sup>⑤</sup>。高句丽侵扰边郡是汉代以来的常事<sup>⑥</sup>，与汉魏情况不同的是，永嘉之乱中的边郡已难获得来自内地的支持，顾全门户成为边郡官长及本地大姓的首要之事<sup>⑦</sup>。不独张统弃守乐浪、带方，玄菟太守裴武死后，其子裴开亦与昌黎太守裴嶷弃郡归附慕容廆<sup>⑧</sup>。可以说，乐浪、带方的弃守其实是西晋统治崩溃的边疆表现。

按《晋书·地理志》所载二郡人口数，乐浪三千七百余户，带方四千九百余户，张统率千余家投奔慕容廆后，二郡尚存相当数量的遗民，且有内地流民不断流入。二郡遗民及内地流民主要聚集于带方郡故地（今黄海南道北部地区）。该地出土铭砖的纪年，从永嘉七年（313）一直延续至元兴三年（404），几乎贯穿整个东晋时期。二郡故地（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出土铭文所见官职包括乐浪、带方二郡太守<sup>⑨</sup>。如安岳三号墓，墓主佟寿自辽东流亡而来，墨书铭记其官称中有“乐浪相”“带方太守”<sup>⑩</sup>。这二郡官职当为东晋所除授。高句丽虽侵乐浪，但在东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受制于慕容氏，加以其政治架构松散，实未能有效统治二郡故地<sup>⑪</sup>。正因如此，在张统弃守二郡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仅郡县制仍然残存于朝鲜半岛，而且乐浪、带方二郡仍是凝聚人心、塑造统治合法性的有效政治旗号。

从东亚政局的视角来看，东晋前中期的乐浪、带方郡主要是作为汉人聚居区而存在，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上的政治势力处于分化组合之中。依据墓葬出土铭文资料，带方太守张□卒于348年，乐浪相、带方太守佟寿卒于357年<sup>⑫</sup>。此后可考的乐浪太守为百济王余句。咸安二年（372）六月，东晋简文帝“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sup>⑬</sup>。这是自汉朝设乐浪郡以来，首次将太守之职授予朝鲜半岛当地首领，

① 关于乐浪郡的沿革及统治疆域，参见郑威：《汉帝国空间边缘的伸缩——以乐浪郡的变迁为例》，《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周振鹤、李小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18—522、837—841页；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35、634—637页。

② 关于4世纪以前日本列岛上诸政权与汉、魏、晋朝的交往过程，参见牟发松：《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史林》2004年第6期。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94页。

③ 沈仁安：《〈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④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7页。

⑤ 《资治通鉴》卷88《晋纪十》“愍帝建兴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799页。

⑥ 按《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第一》、卷14《高句丽本纪第二》、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卷16《高句丽本纪第四》所载，新、汉时期，自高句丽琉璃明王三十三年（公元14年）至山上王元年（197年），高句丽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郡共14次，几乎每十年一次。参见金富轼撰、杨军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186、188、190、193、194、195、200、201、204页。

⑦ 乐浪郡著姓为王、韩、荆、程、张、田、高七姓，以王、韩为首。参见三上次男：《乐浪郡社会の支配構造と土著民社会の状态》，《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第23—87页。

⑧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附裴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1页。

⑨ 赵俊杰：《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赵俊杰：《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

⑩ 佟寿原为建武将军慕容幼司马，在慕容皝与慕容仁的战争中，随慕容幼战没于慕容仁。慕容仁败亡后，佟寿向东逃亡。参见《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5—2816页，《资治通鉴》卷95《晋纪十七》“成帝咸康二年”条，第3005页。有关佟寿墓，参见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和研究》，《考古》1951年第1期。

⑪ 卢泰敦：《高句丽史研究》，张成哲译，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第87—88页。

⑫ 赵俊杰：《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⑬ 《晋书》卷9《太宗简文帝纪》，第223页。

具有令其收复乐浪郡故地的含义<sup>①</sup>。

早期百济的地望在今首尔地区，依据考古发掘，遗址时间断限可上溯至魏晋之际<sup>②</sup>。笔者倾向于认为余句集团原为扶余遗民，在扶余为慕容氏所灭后流亡至汉江流域重构了百济政权<sup>③</sup>。余句曾于咸安二年（372）正月朝贡<sup>④</sup>，乐浪太守之授极可能是应余句所请，这表明百济试图以既有的边郡架构来实现其地区霸权构想。

对于百济而言，此次除授使其成为东晋天下秩序的一部分，分享东晋的制度与文化<sup>⑤</sup>。乐浪太守的政治旗号，能够有效笼络半岛上的二郡遗民与内地流民，还有助于树立起对其他族群的统治权威。依据考古报告，以江原道原州法泉里为代表的濊系地域与以忠清南道公州水村里为代表的马韩地域被置于百济统治下的时间是 4 世纪中后期<sup>⑥</sup>，正与余句领乐浪太守的时间相吻合。在这一时期，百济疆域由 3 世纪时半径为 30 公里的地域，扩大为东至江原道、南至忠清南道的广大地域。百济的领土扩张，正是缘于其尊重郡县制传统、分享东晋统治权力的政治路线。同样，乐浪郡在形式上的延续，也为东晋后期东亚多边关系的规范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权威，这在余句对倭交往上体现得至为明显。

## 二、从百济对倭交往看东晋天下秩序的维系

东晋南朝时期朝鲜半岛是否存在倭人势力的问题，一直是日、韩学界长期争讼的焦点<sup>⑦</sup>。分别编纂完成于 720 年的《日本书纪》与 1145 年的《三国史记》是可资依据的基本文献。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有关倭的记录首次出现于阿莘王六年（397）太子余映“出质于倭国”<sup>⑧</sup>。《日本书纪》则在神功皇后记事中较详细叙述了百济与倭的交往缘起。倭使于丙寅年从卓淳国王处获悉，甲子年七月中曾有三名百济人受命交通“日本贵国”，故倭使遣使“慰劳其王”<sup>⑨</sup>。丁卯年，百济使者经新罗道，与新罗使者共至倭。对于百济使者的到来，“皇太后、太子誉田别尊，大欢喜之曰：‘先王所望，国人今来朝之。痛哉不逮于天皇矣。’群臣皆莫不流涕”<sup>⑩</sup>。

如所周知，《日本书纪》的编纂体现了 7—8 世纪之交律令制建立期的意识形态，对史实裁减、曲解之处甚多<sup>⑪</sup>。所载百济史事，除引《日本旧记》等资料之外，多参引《百济记》《百济本记》《百济新撰》。虽然这些来自百济流人的著述并非完全实录，但却曲折反映了部分事实<sup>⑫</sup>，尤其是神功记事的形成与流亡倭国的百济贵族之复国愿望有直接关联<sup>⑬</sup>，因而也包含了百济后裔对早期历史的记忆。

神功皇后卅九年后的记事一般被拟定在 4 世纪<sup>⑭</sup>，丙寅年为 366 年，甲子年为 364 年，丁卯年为 367 年。丁卯年为近肖古王（余句）二十二年<sup>⑮</sup>，该年被看作百济对倭交往之始。从“先王所望”之语可知倭人对朝鲜半岛长期怀有冀望之心。按《三国志·东夷传》所述，“（辰韩）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sup>⑯</sup>。倭人社会

① 韩昇认为策命百济王继任乐浪太守为东晋国内官封。参见《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第 35 页。

② 韩国考古学界一般将地处首尔的风纳土城、梦村土城被看作是百济的早期都城。风纳土城的建造年代不早于 3 世纪中后期，梦村土城的建造时间更在其后。参见权五荣：《百济最初的王城——风纳土城之调查》，《东南文化》2011 年第 2 期。

③ 参见李磊：《4 世纪中后期百济政权的建构与早期百济史的编纂》，《史林》2017 年第 3 期。

④ 《晋书》卷 9《太宗简文帝纪》，第 221 页。

⑤ 参见李磊：《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⑥ 朴淳發：《百济の漢城期の地方編制過程》，辻秀人編：《百济と倭国》，東京：高志書院，2008 年，第 11—36 页。

⑦ 曹中屏：《任那“官家”与朝、日关系》，《南开学报》1984 年第 3 期。

⑧ 《三国史记》卷 25《百济本纪第三·腆支王》，第 298 页。

⑨ 國史大系編輯會編輯：《日本書紀》（前篇），東京：吉川弘文館，1971 年，第 257—258 页。

⑩ 《日本書紀》卷 9《神功皇后》，第 258—259 页。

⑪ 韩昇：《日本古代修史与〈古事记〉〈日本书纪〉》，《史林》2011 年第 6 期。壹岐一郎：《对日本古代史的重新认识——关于正史〈日本书纪〉的再审视》，《东北亚学刊》2015 年第 3 期。

⑫ 上田正昭：《日本書紀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日本古代国家論究》，東京：塙書房，1969 年，第 410—439 页。

⑬ 高宽敏：《古代朝鮮と日本（倭国）》，東京：雄山閣，2007 年，第 32—34 页。

⑭ 小林敏男：《神功皇后紀の紀年について》，《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考》，東京：校倉書房，2006 年，第 277—289 页。

⑮ 《三国史记》卷 29《年表上》，第 378 页。《三国史记》中“近肖古王”拟定为中国史籍中的“余句”，参见坂元義種《百济史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78 年，第 124—130 页。

⑯ 《三国志》卷 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 853 页。

的发展对半岛东南部的冶铁业依赖极大，尤其是2世纪金海地区冶炼业的出现，朝鲜半岛冶炼中心进一步南移，铁流通网络的改变导致倭人各国间的平衡被打破<sup>①</sup>，从而出现《三国志·东夷传》所言汉魏之际“倭国乱”的局势<sup>②</sup>。倭人社会对朝鲜半岛东南部存在经济依赖关系，这是“先王所望”的具体内涵。

两晋时期，日本列岛尚未出现君主集权的领域形态国家。所谓倭之王权，实由曹魏时期邪马台的外交盟主权发展而来。倭王从朝鲜半岛获取铁资源及权威象征物（铜镜、刀、马具等），吸引西日本地区的豪族首领通过出任王宫并提供军事支持的方式来换取铁资源与新技术，倭王由此与各地豪族首领之间形成人际隶属关系<sup>③</sup>。铁资源是维系倭王权的重要战略资源，倭人政治秩序依赖于朝鲜半岛的资源输入。两晋之际，朝鲜半岛冶铁业格局再度变化。今忠清北道镇川、忠州与庆尚北道庆州等地均发现了始自3—4世纪之交的大规模铁生产遗址<sup>④</sup>。这是倭人企望与百济建立关系的现实原因，故《日本书纪》着力记述了神功皇后交通百济后的感慨（“朕所交亲百济国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sup>⑤</sup>。

按《日本书纪》，在与百济取得联系两年之后，即己巳年（369）春三月，倭军渡海以卓淳国（今庆尚南道昌原市）为据点，“击新罗而破之”；平定洛东江以西南加罗等七国；西回至古奚津，屠南蛮、枕弥多礼，降服比利、辟中、布弥支、半古等四邑<sup>⑥</sup>。然而，古奚津、枕弥多礼及四邑为7世纪白江之战后倭军败退所经之地，《日本书纪》以倭军败退路线为本编撰4世纪入朝之事<sup>⑦</sup>。平定南加罗等七国事，则据钦明辛酉年（541）记百济圣明王所言改编而来。按圣明王所言，“昔我先祖速古王、贵首王之世，安罗、加罗、卓淳、旱岐等，初遣使相通，厚结亲好，以为子弟”<sup>⑧</sup>，与洛东江以西诸国建立关系的是百济而非倭人。唯“（倭）击新罗而破之”，或许为《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所载奈勿尼师今九年（364年）夏四月“倭兵大至”之事。只是《三国史记》所记战果为“倭人大败走，追击，杀之几尽”<sup>⑨</sup>，与《日本书纪》所记相反。

由此可见，在百济与倭取得联系后，即便倭人在朝鲜半岛上展开军事行动，其规模与影响也远不如《日本书纪》所记述的那般大。百济之所以主动联系倭人，乃是出于整体性的战略构想，对倭交往只是其多边交往的一个环节。遣使于倭的次年（368），百济遣使新罗<sup>⑩</sup>，并与洛东江以西加罗、卓淳诸国结好。如果联系爆发于369年九月并延续近三十年的济、丽战争，那么可以判断百济的这些外交活动都是为对高句丽的战争作准备。

369年九月，百济与高句丽战于屯雉壤，取得“获五千余级”的战果，接着于371年十月攻平壤城，杀高句丽王高钊（斯由），取得重大胜利<sup>⑪</sup>。值得注意的是，百济取得战争胜利后，在最短时间内（372年正月）向东晋朝贡。如前所述，入晋朝贡旨在获得“领乐浪太守”之职<sup>⑫</sup>，百济试图通过郡县治理的政治传统，在东晋的天下秩序中建构地区霸权。

《日本书纪》神功记事壬申年（372）秋九月丁卯朔丙子，百济“献七枝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种种重宝”<sup>⑬</sup>。七支刀于明治年间由菅政友在石上神宫中发现，因铭文纪年识读困难而出现诸多解说，其中一说即七支刀由近肖古王世子所造<sup>⑭</sup>。壬申年（372）秋九月余句赠刀已是领乐浪太守之后的事情。赐予倭人刀、镜等

① 東潮：《倭と加耶の国際環境》，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年，第86页。

②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第856页。

③ 20世纪70年代前，日本学界多认为四世纪为统一战争时期，此后多主4世纪倭的国家形态为“人的结合国家”，即倭王与豪族首领之间结成人际隶属关系。参见小林敏男：《古代国家論と国家形成史段階》，《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考》，第277—289页。

④ 孫明助：《古代韓半島の鉄生産の流れ》，松井和幸編：《東アジアの古代鉄文化》，東京：雄山閣，2010年，第31—58页。

⑤⑥⑬ 《日本書紀》（前篇）卷9《神功皇后》，第262、260、262页。

⑦ 关于地望考订，高宽敏认为古奚津在今全罗南道康津郡，枕弥多礼为今济州岛，辟中为今全罗北道金堤市，半古为今全罗南道罗州。参见《古代朝鮮と日本（倭国）》，東京：雄山閣，2007年，第56—61页。

⑧ 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日本書紀》（後篇）卷19《欽明天皇》，東京：吉川弘文館，1971年，第54页。

⑨ 《三国史记》卷3《新罗本纪第三·奈勿尼师今》，第33页。

⑩ 《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第二·近肖古王》，第292页。

⑪ 《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第二·近肖古王》，第293页。卷18《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第221页。

⑫ 《晋书》卷9《简文帝纪》，第223页。

⑬ 七支刀铭文作“七支刀”而非“七枝刀”。七支刀的发现与研究过程，参见宫崎市定著、马云超译：《谜一般的七支刀》，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5—103页。

物是汉魏晋以来的传统。景初二年(238),曹魏曾赐予倭女王“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正始元年(240),“(带方)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赉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sup>①</sup>。余句赠予倭刀、镜,即为遵循汉魏晋王朝的统治传统,以乐浪太守身份赐予倭人刀、镜。

余句在赠予刀、镜之时言:“臣国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铁山,其邈七日行之不及,当饮是水,便取是山铁。”<sup>②</sup>水,指临津江或礼成江。谷那铁山,为黄海道谷山郡海拔 1277 米的大岳山<sup>③</sup>。从临津江到礼成江一带原是乐浪、带方二郡辖地,后为百济与高句丽争战的地带。朝鲜半岛的冶炼技术由乐浪郡向南传播,形成向汉江流域(百济所在地域)与向洛东江、锦江流域传播的两个波次<sup>④</sup>。近肖古王此言寓意有二,一是表明百济战胜高句丽,控制乐浪、带方二郡的旧地;二是表明百济继承了二郡的铁矿及冶炼中心。这些言辞旨在表明余句对二郡政治遗产与物质遗产的双重继承。

由上述可知,当近肖古王余句以郡县制框架建构政权及地区秩序之时,倭人是作为诸种势力之一被纳入其间。这一时期倭人对半岛政局的实际干预能力有限,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上的多边关系是由百济在东晋天下秩序之下主导的。

### 三、辛卯年辰斯王之死与东晋统治权威的削弱

《日本书纪》记载近肖古王对孙枕流王之言:

汝当善修和好(倭),聚敛土物,贡奉不绝,虽死何恨。<sup>⑤</sup>

如上文所述,余句领乐浪太守后,对倭居上位,所言“贡奉”不太可信,然附会之言载于《日本书纪》亦透露出真实的历史信息:枕流王一系王位继承权与倭人有所关联。

余句薨于 375 年,世子须即位,即近仇首王(375—384 年在位)<sup>⑥</sup>。即位之初,百济仍保持着对高句丽的军事优势,然而从 379 年开始,百济接连出现自然灾害,削弱了百济的国力<sup>⑦</sup>,故 377 年平壤之役后百济由攻转守。按《三国史记》记载,近仇首王死于 384 年四月,继位的枕流王死于次年(385)十一月,随后由近仇首王仲子辰斯王继位<sup>⑧</sup>。

这次王位的兄终弟及疑窦重重。按《三国史记》,“(辰斯王)为人强勇,聪惠多智略,枕流之薨也,太子少,故叔父辰斯即位”<sup>⑨</sup>。《日本书纪》明言“王子阿花年少,叔父辰斯夺立为王”<sup>⑩</sup>。文献皆否定了辰斯王继位的正当性。

在中方文献中,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出现了两位百济王的名字,一是百济王须于太元中遣使献生口<sup>⑪</sup>,二是百济王世子余晖于太元十一年(386)被除授“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sup>⑫</sup>。关于余晖的身份,学界有近仇首王、辰斯王两种看法<sup>⑬</sup>。按《三国史记·年表中》所载百济纪年,太元十一年为辰斯王二年<sup>⑭</sup>,将余晖视作辰斯王更加合理。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辰斯王是否为世子的问题。该问题须与辰斯王、阿莘王之间的王位更替问题一同探讨。《日本书纪》:

① 《三国志》卷 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 857 页。

②⑤⑩ 《日本书纪》(前篇)卷 9《神功皇后》,第 262—263、263、264 页。

③ 東潮:《弁辰と加耶の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第 100 集,2004 年 2 月。

④ 金一圭:《最近の調査成果から見た韓国鉄文化の展開》,松井和幸編:《東アジアの古代鉄文化》,東京:雄山閣,2010 年,第 103—123 页。

⑥ 《三国史记》卷 24《百济本纪第二·近仇首王》自注:“一云讳须。”第 294 页。

⑦ 379 年,四月“雨土竟日”;380 年,“大疫,夏五月,地裂,深五丈,横广三丈,三日乃合”;382 年,“春,不雨,至六月,民饥,至有鬻子者,王出官谷赎之”;384 年,“春二月,日有晕三重,宫中大树自拔”。参见《三国史记》卷 24《百济本纪第二·近仇首王》,第 294 页。

⑧ 《三国史记》卷 24《百济本纪第二·枕流王》,第 294—295 页。卷 25《百济本纪第三·辰斯王》,第 296 页。

⑨ 《三国史记》卷 25《百济本纪第三·辰斯王》,第 296 页。

⑩ 《梁书》卷 54《诸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804 页。

⑪ 《晋书》卷 9《孝武帝纪》,第 235 页。

⑫ 《梁书》校勘记:“王须,‘须’,《晋书》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纪作‘余晖’。”《梁书》卷 54《诸夷传》,第 820 页。坂元義種认为余晖即贵须,参见《百济史の研究》,第 136—145 页。津田左右吉认为余晖为辰斯王,参见《百济の王室の系譜及王位の繼承に関する日本書紀の記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二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 年,第 588 页。

⑬ 《三国史记》卷 30《年表中》,第 380 页。

是岁百济辰斯王立之失礼于贵国天皇，故遣纪角宿祢、羽田矢代宿祢、石川宿祢、木菟宿祢，喷让其无礼状。由是，百济国杀辰斯王以谢之。纪角宿祢等便立阿花为王而归。<sup>①</sup>

这段记载出于《百济记》<sup>②</sup>，史源来自百济一方，所述辰斯王死因的可信度较高。辰斯王薨年，《三国史记·年表中》记为壬辰年（392），《百济本纪》载薨于十一月<sup>③</sup>。阿莘王即位时间，《三国遗事·兴法》记为大元十七年（392）二月<sup>④</sup>。阿莘王即位时间早于辰斯王薨没时间，显然记述有误。《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辰斯王八年（薨年）七月，高句丽王谈德帅兵四万攻百济，十月攻陷关弥城。《高句丽本纪》相关史实载于广开土王（谈德）元年条目之下<sup>⑤</sup>。据《好太王碑》碑文，“（广开土王）号为永乐太王，……永乐五年，岁在乙未”<sup>⑥</sup>。永乐为广开土王生前尊号，永乐五年为乙未年（395），元年为辛卯年（391）。辰斯王八年对应于广开土王元年，则辰斯王薨年为辛卯年。

辛卯年即《好太王碑》碑文所述倭破百济之年，——“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sup>⑦</sup>。如果所述为实，则辛卯年是百济由盛转衰的坐标性年份。该年，百济不仅在七月至十月间受到高句丽攻击，而且为倭所破，辰斯王亦死于十一月。《三国史记》：

王田于狗原，经旬不返，十一月，薨于狗原行宫。<sup>⑧</sup>

狗原，《三国史记·地理四》列入“三国有名未详地分”条下<sup>⑨</sup>。辛卯年十月高句丽攻拔关弥城，辰斯王在紧急事态下仍田猎于狗原经旬不返，这一反常之举表明辰斯王已经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如作大胆猜测，在十月高句丽南伐百济之际，倭人势力趁机进入百济，并与反辰斯王的势力相结合，以至于辰斯王出奔狗原，最后被百济的亲倭势力所杀。

辰斯王薨于辛卯年，而非《三国史记》所记的壬辰年，则辰斯王纪年当提前一年，即继位于384年，薨于391年。如此百济王系中便不再有枕流王的位置，辰斯王王位直接继承自近仇首王，《晋书》所称“百济王世子余晖”乃辰斯王的真实身份。

辰斯王“夺立为王”形象的出现，与阿莘王塑造统治合法性有关。上引《日本书纪》将阿莘王即位记为纪角宿祢等“便立”的结果，此为不实之事<sup>⑩</sup>。阿莘王即位于太元十七年（392）二月，可知在辛卯年（391）十一月辰斯王薨后的三个月里，百济王位悬空。易言之，阿莘王继承王位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政治博弈。

按《三国史记》所述，阿莘王“初生于汉城别宫，神光照夜，及壮，志气豪迈，好鹰马”<sup>⑪</sup>。“神光照夜”，一般只用于开国君主，对阿莘王的这一描述，其实反映百济王位的断裂性。“生于汉城别宫”也隐晦指出阿莘王的非正统出身。按晋宋时观念，“志气豪迈，好鹰马”，是政治野心的表达<sup>⑫</sup>。据以逆推，百济王系中枕流王（阿莘王之父）的存在，或许是一个虚构叙事，旨在述说阿莘王继位的历史合法性。在近仇首王、辰斯王的王系之间插入枕流王，并将辰斯王诬为“夺立”者，那么杀辰斯王之事便具有了正义性。《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枕流王事迹除朝贡东晋外，只有迎胡僧礼敬、创寺于汉山之事<sup>⑬</sup>。按《三国遗事·兴法》所述，阿莘王即位后“下教崇信佛法求福”<sup>⑭</sup>，可知阿莘王力图以政治力量传播佛教信仰，这其实是借佛教论

① 引文中“阿花”即《三国史记》中“阿莘王”。《日本书纪》（前篇）卷10《应神天皇》，第271页。

② 金廷鹤：《百济史与倭国》，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139—140页。

③ 《三国史记》卷30《年表中》，第381页。卷25《百济本纪第三·辰斯王》，第297页。

④ 一然撰、孙文范校勘：《三国遗事》卷3《兴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⑤ 《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辰斯王》，第297页；卷18《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223页。

⑥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6、208页。

⑦ 关于辛卯年条记事的文字拟定，参见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210页。耿铁华：《好太王碑辛卯年条与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

⑧⑨ 《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辰斯王》，第297页。

⑩ 《三国史记》卷37《杂志第六·地理》，第531页。

⑪ 金廷鹤：《百济史与倭国》，第140页。

⑫ 周一良：《刘义庆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4—166页。

⑬ 《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第二·枕流王》，第294—295页。

⑭ 《三国遗事》卷3《兴法》，第108页。

证其统治合法性<sup>①</sup>。因此,将枕流王虚构为百济弘扬佛法之始祖,这也是阿莘王意识形态建构的题中之义。

辰斯王余晖被杀,是百济借东晋权威建构地区秩序路线的一次重大挫折。虽然余晖没有被策命为乐浪太守,但他继承了前王的镇东将军号,而且加“使持节”“都督”,这意味着余晖获得杀二千石以下的专权,以及所督区内的最高军事指挥权<sup>②</sup>。尽管“外臣的内臣化”是4世纪以后的常态<sup>③</sup>,但就东晋而论,对外除授将军号及加“使持节”“都督”,余句、余晖开其先河<sup>④</sup>,东晋朝廷很清楚这些官号所具有的权责内涵,因而难言除授余晖仅具虚封之义。辰斯王余晖之死,表明东晋的统治权威在辛卯年的东亚政局中被削弱,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局势的发展已经开始破坏东晋的天下秩序。

#### 四、东晋天下秩序的短暂退场与济、倭“和通”

阿莘王即位后,按《百济记》,“无礼于贵国,故夺我枕弥多礼,及岷南、支侵、谷那、东韩之地”<sup>⑤</sup>。阿莘王被记为“无礼”,乃因编撰者的亲倭立场,非为史实<sup>⑥</sup>,但所言倭人动向则如实反映其战略意图。谷那为百济产铁之地,辛卯年倭人入侵,或意在趁百济新败于高句丽而控制其冶铁中心。

百济向倭靠拢,是在丁酉年(397)。按《好太王碑》碑文所述,辛卯年百济为倭所破,倭“以为臣民”,为了惩罚百济“为(倭)臣民”,故广开土王于丙申年(396)“讨伐残国”<sup>⑦</sup>。次年五月,“(阿莘)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sup>⑧</sup>。《百济记》亦言:“是以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修先王之好也。”<sup>⑨</sup>这表明百济与倭的关系在性质上发生变化。

按《三国史记》,遣太子为质的次年(398),百济全年备战<sup>⑩</sup>,这显然是以与倭“结好”为基础。据《好太王碑》碑文,广开土王于同年“教遣偏师观帛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斯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自此以来,朝贡论事”<sup>⑪</sup>。阿莘王于八月出兵后,“其夜大星落营中有声,王深恶之,乃止”<sup>⑫</sup>。动摇阿莘王北伐决心的,除夜落大星的噩兆外,还有高句丽的军事压力<sup>⑬</sup>。

《好太王碑》碑文又述,“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sup>⑭</sup>。《三国史记》记同年(399)八月,“王欲侵高句丽,大征兵马”<sup>⑮</sup>。阿莘王之所以持续用兵高句丽,或缘于其合法性不足,这迫使百济逐步深化与倭的关系。碑文所言“和通”,特指百济与倭之间的军事合作,如碑文言甲辰年(404)倭“和通残兵”<sup>⑯</sup>。

① 吉基泰:《汉城百济의 對外交流와 佛教》,《百济研究》제 55 호(忠南大學校 百济研究所,2012),67—90면。

② 《宋书》卷39《百官上》:“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25页。参见张鹤泉:《东晋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特点及其权力问题试探》,《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张小稳:《汉唐间地方官加节的等级划分与权力演变》,《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③ 谷川道雄:《東アジア形成期の史的構造—冊封体制を中心として》,唐代史研究会編:《隋唐帝国と東アジア》,東京:汲古書院,1979年,第102页。

④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第35页。

⑤ 《日本書紀》(前篇)卷10《應神天皇》注引,第272页。

⑥ 高宽敏:《古代朝鮮と日本(倭国)》,第69页。

⑦ 王健群认为辛卯年条不能独立存在,该叙事是为了说明六年丙申高句丽出兵百济的理由,故将“以辛卯年来”训为“辛卯年以来”。参见《好太王碑六年丙申、八年戊戌条考释》,《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4期。王仲殊认为“来”为动词,“以”为时间助词。参见《关于好太王碑辛卯年条的释读》,《考古》1990年第11期;《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考古》1991年第12期。

⑧⑩ 《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第298页。

⑨ 《日本書紀》(前篇)卷10《應神天皇》注引,第272页。

⑪ 二月阿莘王调整将领,以真武为兵官佐平,沙豆为左将;三月筑双岷城;八月“王将伐高句丽,出师至汉山北栅”;九月“集都人习射于西台”。参见《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第298页。

⑫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6—217页。

⑬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220页。李金超认为395年洮水之战是高句丽、百济强弱易势的转折。《试论洮水之战对5世纪初朝鲜半岛政局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3期。

⑭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214页。

⑮ 《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第298页。

⑯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220页。孙炜冉认为百济与倭的军事同盟成立于庚子年(400)倭败于高句丽之后。《五世纪的丽倭战争述论》,《东北史地》2014年第3期。

庚子年(400),广开土王“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倭寇大溃”“残倭溃逃”<sup>①</sup>。《好太王碑》《三国史记》缺乏此战中有关百济的记载,但《百济本纪》记该年“星孛于奎娄”“日有食之”等灾异之相<sup>②</sup>,显然以亲倭为叙事立场。甲辰年(404),“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和通残兵□[石城],□连船□□□”<sup>③</sup>。带方在百济北,倭兵须经百济方能“侵入带方界”。百济与倭首次联合对高句丽作战。其实前一年(403),百济已经配合倭的半岛战略,“遣兵侵新罗边境”,报复新罗向高句丽朝贡<sup>④</sup>。

除军事“和通”外,阿莘王时期还是百济向倭输出技术、汉籍乃至移民的重要时期,《日本书纪》将衣缝始祖真毛津、书首始祖王仁等由百济赴日的时间皆拟定在阿莘王末期<sup>⑤</sup>。阿莘王放弃了近肖古王、近仇首王、辰斯王三代以来向东晋朝贡、获取东晋支持的外交路线,这使得东晋的天下秩序暂时缺席于4—5世纪之交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

## 五、东晋末年天下秩序的重构及其对东亚政局的影响

甲辰年(404)之战后,倭人军事势力退出半岛<sup>⑥</sup>,但次年阿莘王薨后诸弟争权,倭以兵士百人卫送腆支王归国即位<sup>⑦</sup>,继续干预百济内政。腆支王名映<sup>⑧</sup>,丙午年(406)正月“谒东明庙,祭天地于南坛,大赦”,在完成即位礼的次月便“遣使人晋朝贡”<sup>⑨</sup>。又据《好太王碑》,丁未年(407)广开土王派遣步、骑五万出征,“斩煞荡尽”,还破沙沟城、娄城等地。若此战为征百济之战,则为余映即位以来最大危机,但此战并无倭人参战<sup>⑩</sup>。可见余映即位之初着手修正“和通”倭人的路线,以回归东晋天下秩序的方式合法化统治,并借以平衡倭人势力。

此时东晋正处于国势振作期,义熙四年(408)收复山东半岛、义熙十二年(416)收复洛阳、义熙十三年(417)收复长安,晋安帝诏书盛言东晋国威“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外,罔有不服”<sup>⑪</sup>。收复山东半岛,意味着东晋扼守了朝鲜半岛通往大陆的海上通道<sup>⑫</sup>,乃至具有直接干预朝鲜半岛的能力<sup>⑬</sup>,这成为东晋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重新纳入天下秩序的重要契机。

对此时局之变,高句丽、倭予以积极应对,均于义熙九年(413)朝贡<sup>⑭</sup>。史籍中缺乏同年百济的朝贡记载,似乎倭人朝贡未与百济同行,这从侧面反映了余映独立于倭的外交政策。然而,余映虽早在义熙二年(406)便朝贡东晋,却并未获得封授。相反,宿敌高句丽王高琏在义熙九年受封为“乐浪公”<sup>⑮</sup>。按晋封爵六等制,“乐浪公”全称为“乐浪郡公”,“制度如小国王”<sup>⑯</sup>。从余句“领乐浪太守”到高琏为“乐浪公”,东晋对乐浪郡归属的态度发生了变化<sup>⑰</sup>。余映迟至义熙十二年(416)才被封授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sup>⑱</sup>。官爵虽与余晖相同,但距余晖之封已隔三十年,这或是因余晖之死挑战东晋权威所致。

①③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171—173、216—217页,第220页。

② 《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第298页。

④ 《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第298页。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217页。

⑤ 阿莘王薨于405年,真毛津赴日记为应神十四年(403)、王仁赴日记为应神十六年(405)。见《日本书纪》(前篇)卷10《应神天皇》,第276—277页。

⑥ 杨军:《4—6世纪朝鲜半岛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⑦⑨ 《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腆支王》,第299页。

⑧ 《三国史记》卷25《百济本纪第三·腆支王》,第298页。坂元義種认为“余映”为腆支王原名,“腆”为“映”抄写之误。见《百济史の研究》,第136—145页。

⑩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221页。

⑪ 《宋书》卷1《武帝纪上》,第16—17页;卷2《武帝纪中》,第36、42—43页。

⑫ 川本芳昭:《倭的五王による劉宋遣使の開始とその終焉》,《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第537—562页。

⑬ 秦汉时期山东半岛的航海活动,参见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刘宋山东半岛得失对朝鲜半岛政局的影响,参见李磊:《汉城百济覆灭考论——兼论刘宋衰亡的东亚影响》,《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⑭ 《晋书》卷10《安帝纪》,第264页。

⑮ 《宋书》卷97《夷蛮传》:“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第2392页。

⑯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31《职官十三》“历代王侯封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60页。

⑰ 李磊:《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⑱ 《宋书》卷97《夷蛮传》,第2393页。

封授余映,是东晋朝廷对辛卯年王系更替后百济王权合法性的承认。这一承认更多与晋宋易代有关,在封授余映的同一年,刘裕收复洛阳、进爵宋公、备九锡,改朝换代已提上日程,天下秩序自不须墨守成规<sup>①</sup>。刘宋建立后,高句丽、百济、倭的多边关系被置于新的天下秩序中予以重新规范<sup>②</sup>。晋宋之际的中原王朝虽未直接统治朝鲜半岛,但仍是当日东亚政局的决定性力量。百济国势未能恢复余句时代,地位却较为高,其缘由正在于余映选择了重归东晋天下秩序,借东晋国势伸张之机扭转了辛卯年以来受制于倭的发展趋势。

## 结论

在“东亚世界”形成论的叙事中,两晋之际中原王朝结束对朝鲜半岛的直接统治被看作是“东亚世界”的开端。然而,乐浪、带方二郡弃守于永嘉之乱,并非缘于周边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而是西晋统治秩序崩溃的边疆表现。正因如此,在二郡弃守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并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能够接替二郡的统治,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内的东亚地区依旧在中原王朝留存下来的政治传统中构建多边关系。朝鲜半岛上的二郡遗民与内地流民以郡县制为组织方式,其区域自治一直延续于东晋中期。随后百济崛起,近肖古王余句通过领乐浪太守构建区域权力,倭人作为诸种势力之一被纳入百济主导的多边关系之中。

东晋的天下秩序经由百济对中原王朝统治传统的承认,以郡县制、都督制为制度支撑,延续至辛卯年(391)。该年百济为高句丽所破,东晋封授的辰斯王余晖被亲倭势力所杀,继任的阿莘王与倭“和通”抗衡高句丽,东晋天下秩序短暂退场。义熙北伐收复山东半岛使得东晋增强了经略朝鲜半岛的能力,但重构的天下秩序将高句丽、百济、倭并行纳入其中,这是出于对现实利益格局的承认,表明东晋王朝由直接统治者转变为多边关系调解者,天下秩序的性质由此发生变化。

[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中华认同与南北朝时代的国家建构”(14PJJC030)和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第50批)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奇)

① 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② 葭森健介著、张宇译:《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中国皇权——以六朝时期为重点》,《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4期。

##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Power Operation in 4th Century's East Asia

Li Lei

**Abstract:** Lelang and Daifang were abandoned in Yongjia Chaos, not due to the border crisis, but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s ruling order.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sti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gathering the people and shap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e. The people remained were organized in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King Geunchogo constructed the regional leadership b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ekje and Wa was one part of multilateral relations. The aim of the war broken in 369 among Wa and the Korean states was to occupy iron produce center. It was that King Geunchogo sent knife and mirror to Wa in 372 was the fact that he performed the duty of Lelang procurator. The year of 391 wa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Baekje, in which King Jinsa was killed by the group who was supported by Wa. It forced King Asin who succeeded the crown to resist Goguryeo and rely on Wa in 399. The "Wa" who interfered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Baekje was great clan in Baekje.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uSong Dynasty on its world system m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ekje and Wa reserve. The reason that Wa consisted to present tribute to LiuSong Court in 5th century was to seize the leadership on Baekje.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ekje and Wa strengthened the authority of LiuSong Court.

**Key words:**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East Asia, Baekje, Wa